

红色印记

中央苏区时期的科技人才工作

□张小清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医药卫生、军工通信等各项科技事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如何开展科技人才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科技人才领导、培养、吸纳、激励等人才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不仅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各项科技事业的发展,支援了反“围剿”斗争,而且培养造就大批科技人才。

中央苏区时期“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党的科技人才工作自然也要坚持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的政治方向,为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服务。

1930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要“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1933年10月的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检讨过去教育工作的错误,其中之一为缺乏对于教育服从于战争的了解。一个月后的《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着重强调,要强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知识劳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去当红军和在苏区服务。把握科技人才工作为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政治方向,是完全符合从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的,成为领导科技人才工作的根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治引领上,还表现在思想宣传和组织领导等方面。1933年9月,张闻天指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与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及管理的工具”。中央苏区采取标语口号、文艺活动、革命刊物等多种途径和宣传方式,纠正来自旧军队、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行业中科技人才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引导其坚定的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觉悟。

此外,中央苏区还组建了专业技术管理部

门和领导机构,为科技人才提供强劲的组织保障。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例,1932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下设总务处、政治部、医院管理局、医政局、药材局、保健局、保卫局等,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划分。1933年起,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1933年9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再到社团的医疗卫生人才管理和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有了统一而强劲的组织领导。

独立自主培养科技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是中央苏区时期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关于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才即培养标准的问题。中央苏区旨在培养“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积极拥护土地革命、工作积极艰苦耐劳、有活动力量”的“又红又专”科技人才。红军卫生学校的教育方针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何叔衡在给红军通讯学校学员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既要刻苦学好技术,又要努力学好政治,使自己成为红色的通讯技术人员”。

其次,关于怎样培养科技人才即培养方式的问题。一方面是“教育成才”,开办各层次各类型的科技人才培养学校和训练班。“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苏区干部的自给”。主要有:1931年2月开办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1932年1月开办的红军无线电学校,1932年2月成立的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3月建立的中央农业学校,1933年9月设立的农事试验场……这些学校和短训班技术培训班快速、大规模地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技术精明的业务骨干。

另一方面是“实践育才”,“使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的联系起来”,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如中央农业学校学员经常到各地去调查作物种植和生长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红三军团医训班挑选部队最常见病和最常用的药来进行治疗。中央苏区科技人才培养注重理论教学、科

学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学用一致,直接服务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

鉴于严重缺乏科技人才的现实困难,除了自主培养人才外,党还积极从党内党外吸纳、调集军医、交通、修理军械等科技人才。一是任用党中央选派或海外归来科技人才。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便指明,红军急需医生及造炸弹师数名等工作人员,希望中央派人来。1931年初,中共中央选派贺诚、彭真、陈志方等医务人员充实中央苏区。曾在德国学习工业科技的兵工专家刘鼎于1933年春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二是招募来自白区和当地的科技人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专门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现金聘请“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1932年,奉天兵工厂工人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被选派前往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曾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璋迁往瑞金并把医院和家产全部捐赠给党,成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戴济民曾在吉安开设私人诊所,经过红军争取,携带诊所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加入红军。

三是感召国民党军队起义和俘虏中的科技人才。红军中最早的无线电人才,如王诤、刘寅、李治在龙岗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军医陈义厚参加宁都起义并加入红军和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漳州战役后,红军动员国民党军修械厂20多名战俘技术工人加入官田兵工厂。在党的思想改造和组织领导下,来自五湖四海、成分复杂的这样一支科技人才队伍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最是服务暖人心。为改善科技人员等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其社会地位,中央苏区颁布了专门的优待条例。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从经济优待、医疗优待、工作奖励等方面优待教员,把教员的物

质生活待遇提高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地位,并给予绩效奖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向红军各军团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对于特别好的技术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的分配给他们,使们不感缺乏”。

这些优待措施为科技人才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其更加安心、更有精力发挥技术专长,全心投身革命根据地各项科技事业建设和革命斗争。

为激发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苏区还对科技人才进行物质与荣誉的奖励,并广泛宣传杰出科技人才的光辉事迹,号召大家学习。1933年4月30日的红校模型室开学典礼上,政治部为积极建设者颁发各种奖品,其中建委吴子罕、锡工杨沐兴、水泥工赖洪辉、雕刻工曾聊生、木工刘良发获得银牌,木业协会获得一面题为“最积极参加红校模型室建设者”的优胜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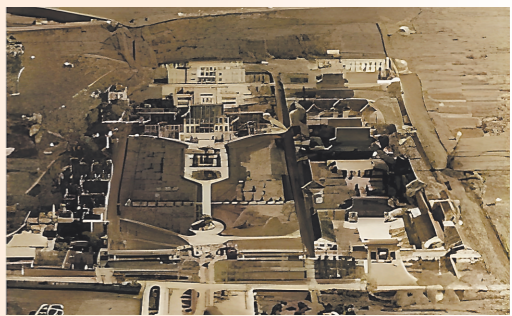
《红色中华》等报刊多次报道科技人员的技术发明创造,如第99期宣传通讯学校刘校长善于研究,发明可以代替蜡纸用的毛边纸;第113期表扬兵工厂第一分厂的一名谢氏工人发明了制造洋钢的方法;第168期号召各县学习万泰县的植棉经验;第201期介绍了傅连璋等中央红色医院医生及工作人员发现用廉价的苏打水和雷佛尔可以治愈出血性黄疸和脓疱性疥疮,这堪称“苏维埃医药界的新发现”。

中央苏区对杰出科技人才优秀事迹的宣传表扬,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缓解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压力,同时营造出苏区尊重各类科技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尽管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革命环境极为艰难困苦,但仍想方设法、克服万难,大力开展科技人才工作,并初步建立起一支不可或缺的科技人才队伍,发展了工农业、医药卫生、军工通信等科技事业。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闽人遗事



南京考试院建筑群鸟瞰图

卢毓骏“天圆地方”的建筑美学

□张铭鑫 杨培峰

卢毓骏(1904—1975),字于正,是20世纪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他于1916年毕业于福州高级工业学校(现福建理工大学),1920年赴法留学,1929年回国投身工作,一生致力于建筑实践和建筑教育。1949年赴台发展,于1975年病逝。

卢毓骏父亲在福州开了一家书店,家里收藏有大量的书籍,因此他自小富五车,且有着浓厚的民族情怀。20世纪初,福州作为当时重要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接收西方经贸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建筑异彩纷呈,呈现出中西结合样式。此时,卢毓骏上学期间正接受着工科思维教育,生活的见闻和时代的更替激发了他大胆的建筑个性和活跃的美学思想。

国内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领导者,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促进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在巴黎、国内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随之“勤工俭学”浪潮的出现,为中国有志之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遇。1920年,卢毓骏也趁此踏上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旅程,并最终进入巴黎国立公共工程大学的建筑学院,开启了他的建筑生涯之旅。

《欧程见闻记》里记载了卢毓骏旅途中的惊喜,从香港的繁华商业区、商务印书馆,到西贡的广场等繁华景象,都深深地为之打动,流露出迫切投入对祖国未来建设的关心和期许。

1929年,卢毓骏怀揣着振兴中国建筑的满腔热血,开启了他的都市设计生涯。同年,他被聘为南京特区政府工程技术员、建设课课长,也是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兼职讲师。因机缘巧合,卢毓骏颇受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器重,聘其组织设计南京考试院。

考试院坐落在南京鸡笼山东麓、玄武湖南岸,总计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院落采用四方规整构造,对称性十足,饱含“天人合一”的构造理念。其外观造型属于我国传统古代官阙样式,青砖黛瓦,飞檐拱脊,大厦重楼,是一座典范性明清时期院落式建筑。其中,建筑材料又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一味地建造大屋顶,结合了西式平顶风格,具有较高的现代感和美感,既有西方现代派简约风格,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特征。

该建筑群充分体现出卢毓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建筑构想,以及在中国“天圆地方”文化中不拘于死板造型,结合西式理念,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中式建筑。南京考试院建筑群的完工,建立起卢毓骏在建筑界“中国古典造型”的建筑师形象。其间,他还参与了洛阳白马寺的测绘和修复工作,并对西安的大雁塔、周公庙、日晷台以及南京的旧国子监进行了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卢毓骏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置身于防空工程建设中。1935年相继发表《理想的防空都市》《各国城市防空建设之趋向》,1941年发表《防空城市计划之研究》和《防空城市计划之研究二》,1942年《防空建筑设计学》出版,1944年《30年来我国之建筑业》出版,1947年《防空建筑学》出版。卢毓骏对防空建筑的贡献是杰出而伟大的,为国民留下了宝贵的谏言和学术成果。

卢毓骏在《现代建筑》一书中提到:“现代建筑打破因袭与模仿,崇尚创作。不特因袭古代建筑不可,即模仿现代建筑特征,依样画葫芦,而不明其真理,亦不可。因建筑乃随空间与时间而演进,具有激发心灵之生活艺术。若溯西洋建筑自文艺复兴以后乃至十九世纪初期,许多建筑尽属因袭,致鲜进步。中国建筑亦不能例外,其对于结构上与材料使用上往往失去却古代建筑之原来真实表现。吾作此语,读者当为明眼所谓不因袭并非轻视旧文化之谓。”

“欧洲中世纪哥特(哥特)式大教堂充盈技巧庄严与活跃之精神,至于我国古代官阙建筑,以木造结构而具有如哥特式之技巧与宏伟。”他发现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充满了庄严和活跃的气息,而中国古代的官阙建筑则以木质结构为主,具有哥特式的技巧和宏伟的气势。指出中国建筑应顺应潮流,但并非让潮流淹没中国固有式建筑,而是让潮流与建筑共存共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潮流建筑。

卢毓骏不仅是儒家和道教文化的信仰者,在建筑整体形态布局中,他还悉心融入了艺术氛围,迎合大众艺术多样化的需求。《现代建筑》中,他提出“建筑不离工程科学,同时亦是一种造型艺术……艺术家之精神与技术家之理智,宜合于一身,此则建筑家之本质也”“工程师与建筑师之分,历时已久。以致美学与力学终致脱节,阻碍建筑之进步……力学与美学必须一致,乃为现代建筑精神之所在”。

从中可以看出,卢毓骏在建筑创造中讲究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认为艺术美学是推进建筑进步、发展现代建筑的关键一步。

乡土横记

晋江南天寺石窟:“唐盛宋衰”的例外

□孙群 王卓茜 文/图

南天寺位于晋江市东石镇许家坑村岱峰山,始建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原名石佛岩,俗称石佛寺,被认定是日本大阪堺市泉南佛国寺的祖庙,见证了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寺内保存的3尊南宋时期的石佛及摩崖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重修南天禅寺碑》记载:“嘉定丙子(1216年)一庵净师过此,夜见峭壁灿光三道,是山萃众岳之灵,遂募镌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建造殿宇,因就石佛为号……”碑文中指出,南宋时一庵净师经过岱峰山时,夜晚见山崖现出光芒,于是募捐在此凿佛菩萨圣像,并建造寺庙。

南天寺坐落於岱峰山西南面山麓。岱峰山又名石佛山,海拔76.6米,位于晋江东石与安海之间,濒临东海,西北面为安平桥,来脉为龙源山,山前有龙江、鸿江、围头湾和深沟湾环绕。据说石佛山像头卧牛,而南天寺正好位于卧牛的前胸位置,山环水抱,风水极佳。

南天寺依山而建,坐东朝西,近年来逐步扩建,采用主轴对称结合自由式布局。中轴线依次为山门、放生池、天王殿、七舍利塔、新大雄宝殿、佛祖诞生石壁、旧大雄宝殿,南面为钟楼、石林精舍、法堂(念佛堂)、镇南宫、南天寺理事会等,北面为鼓楼、海会塔、凉亭、摩崖石刻等,其中从天王殿到大雄宝殿两侧建有落塔式廊庑。主体建筑群南面还有放生池、观音亭、僧寮等,北面为园林区,庙宇规模宏大。

旧大雄宝殿保留清代建筑格局,为泉州传统“皇宫式”大殿,一进四合院,中轴线为门厅、天井、大殿,两侧廊庑。门厅为三川脊硬山顶,覆盖红瓦,正脊脊刹置宝葫芦,脊

脊为实塔,两端燕尾脊高翘。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塌寿为孤塌,明间开门,两旁各有一个抱鼓石,门上匾额为清乾隆间状元及第、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所题的楷书“自在佛”三字,字高1.6米,气势磅礴。

次间辟圆形蓝色菱花木窗,两侧楹联“梵宇清幽高居岱山视万籁,惠山山升但愿苍生安乐土”“慈怀大地预期万象享升平,南天霞蔚遥临石水览千帆”。身堵木板上彩画山水图,裙堵石浮雕麒麟奔跑、双狮戏球,对看堵嵌影雕博古图,水车堵灰塑戏狮、花鸟及博古纹。檐下施一斗三升拱与弯枋,垂花、立仙、雀替木雕雕梁、戏狮、花草纹。

大殿为重檐歇山顶,正脊脊刹置五层宝塔,两旁各有一只剪粘飞龙,燕尾脊翘起。面阔五间,通进深四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明间、次间设直棂窗隔扇,稍间辟八角形螭龙木窗,四周木雕蝙蝠、博古、花鸟等。檐下施多层弯枋与连拱,垂花、立仙、雀替木雕雕梁、仙人、花鸟,剖彩影画山水图。大门对联为明代诗人黄伯善所撰“寂寞空门不贪金色相,慈悲菩萨原是石肝肠”,前檐重檐下牌匾楷书“石上异光”,殿门上方牌匾楷书“南天禅寺”四字为清代威略将军吴英所书。

大殿内崖壁佛龛高6.9米,龛内依崖壁凿3尊通高6.9米的西方三圣像,雕像间距0.5米,并排跏趺坐于四座仰莲座之上,身后有圆形火焰身光,为泉州地区最大的石雕古佛像。中间是阿弥陀佛,身后刻以素面圆形背光,头上螺发,耳朵垂到双肩,弯眉眯目,面容安详,披衣露乳,胸口有“卍”字纹,双手结禅定印,后面崖壁上浮雕两根盘龙石柱。左边是观世音菩萨,后有圆形背光,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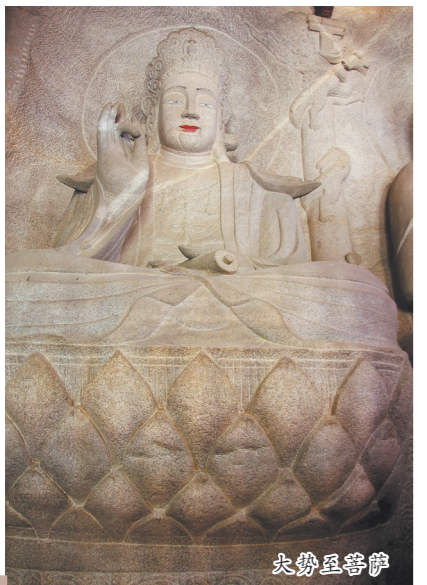


3尊南宋时期的石佛

戴繁丽花冠,花冠正中浮雕一小尊坐佛,面露慈祥,双眼微睁,身饰天衣,左手施手印,右手持净瓶,线条疏密有致,从表情、手势到坐姿等,均与雕于南宋的大足北山佛湾第一三六窟日月观音、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二九窟观音像以及大足石门山第六窟观音像等颇有几分神似。

右边是大势至菩萨,后有圆形背光,头戴繁丽花冠,花冠正中浮雕一净瓶,面露微笑,帛带飘逸,线条疏密有致,左手执佛经,右手施手印,胸部饰璎珞。

两侧还有浅浮雕护法神,表情严肃。石壁上刻有明弘治六年(1493年)的“心”字,下方刻“放下全无事,提起万般生”,劝人放



大佛菩萨像



南天寺